



超越“文化主義”

——走向亞洲世紀的“全球社會科學”

[澳大利亞]卡尼什卡·賈亞蘇利亞

(阿德萊大學 印度—太平洋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澳大利亞 阿德雷德 5000)



[摘要]越來越廣泛的亞洲問題研究將出現“亞洲世紀”，它使全球性的社會科學成為可能。目前關鍵問題不是生產多少有關亞洲的知識，而是在如何研究以及採用什麼研究方式上使亞洲研究能夠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社會科學”參數提供支撐。要想成功，就要超越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s studies)範式。這一範式的特徵是，把研究問題看成是一種佈局，研究基礎是從一個特定的“區域”角度來理解，由此結成一個更廣泛的“文化主義”問題之網。在這種背景中形成的“文化主義”，是通過一整套制度與知識的做法，將隱藏在社會、政治關係中的文化過程剝離出來，抽象為一組概念（語言的、宗教的，等等），依次成為能夠從特定區域理解社會、政治過程的基礎。但“亞洲世紀”來臨後，由亞洲資本主義轉化帶來的社會、經濟、政治矛盾已經表現出“去政治化”的傾向。學者們祇有以問題為導向，重視當代社會科學問題的跨國界、跨學科性質，繞開以往那種“區域研究”的範式，超越“文化主義”藩籬，纔能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科學。

[關鍵詞]亞洲 社會科學 全球社會科學 文化 研究範式

[作者簡介]卡尼希卡·賈亞蘇里亞 (1959—)，男，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先後就職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悉尼大學、默多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阿德萊大學印度—太平洋政府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IPGRC)、國際政治學教授，主要從事全球化與國家結構的轉化及區域政府管理研究，代表性著作有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Asia*、*Statecraft: Wel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Reconstituting the Global Liberal Order: Legitimacy and Regulation* 等。

Title: Beyond the Culturalist Problematic: Towards a "Global Social Science" in the Asian Century

Abstract: The so called "Asian Century" allows us to build a Global Social Science. The strategic issue is not primarily producing knowledge about Asia, but how, and in what way, the study of Asia can contribute to determining the parameters of a truly global social science. But this, among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transcending the so-called "areas studies" paradigm that underpins much of the public policy discussion on Asian literacy. The Areas Study paradigm incorporates a configuration of research problems based o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area". We argue that this has the effect of depoliticizing the key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emerging out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in Asia.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we suggest a way of developing a global social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problem oriented approach to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Asia, social science, global social science, China, culturalism, problem oriented strategies

Author: Kanishka Jayasuriya is a PhD fro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Indo-Pacific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re (IPGRC) an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rea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 particular,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Email: kanishka.jayasuriya@adelaide.edu.au

隨着亞洲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在未來幾十年中，會有大量關於亞洲研究的論著出版，因此，說“亞洲世紀”即將來臨並非虛妄。但是，

所謂“亞洲世紀”的到來，指的不是我們擁有多有關亞洲的知識，或者是為獲得這樣的知識來拓寬相關機構研究的範圍，而是要挑戰社會科學



的某些基本假設，要使某些重要的假設變成問題，促進亞洲研究的發展。也就是說，不是研究者如何回應“亞洲世紀”，而是“亞洲世紀”挑戰研究者的方式已超出了某些主流社會科學和“區域研究”所限定的假設。所以，關鍵問題不是要生產多少有關亞洲的知識，而是在如何研究以及採用什麼研究方式上使亞洲研究能夠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社會科學”參數提供支撑。在本文中，我想說明的是，亞洲的崛起有可能建立“全球社會科學”，但是，建立這樣的全球社會科學不僅僅是把亞洲放入社會科學的熔爐中。建立“全球社會科學”要求我們超越某些基本假設，這些假設一直在指導着世界不少地方的社會科學研究和區域研究。

一、“文化主義”問題與“亞洲能力”

“文化主義”問題是區域研究的中心問題，區域研究在“文化主義”問題中得到了構建與組織。區域研究範式的特徵是，將研究問題當做一種佈局，研究基礎是從“區域”角度來理解。與傳統的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視野不同，它是依據區域的不同特點和環境進行定義或說明的，甚至後殖民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回應（比如，研究“現代性”的替代路徑等）都被套在了“西方/亞洲”這些毫無價值的二元對立之中。

“區域研究”最早出現在美國，之後有了長足的發展，它是以“冷戰”為標誌的。但是，“冷戰”結束以後，區域研究並沒有結束，學者們祇是對於它的定位在認識上產生了一些分歧——我們應該如何做，做什麼？因為重點已轉向了研究亞洲的貿易問題和經濟騰飛。

在澳大利亞，“文化主義”問題對制定公共政策策略產生了影響，這些策略圍繞有關“亞洲能力”概念來建構。目前，“亞洲能力”概念處在澳大利亞教育策略的中心位置，在技術統治論者的政策語言中被精心構築起來，與“西方文化/亞洲文化”、“西方社會/亞洲社會”這種二元對立同步而來。^①正是這種並非明晰的“現代化”框架結構和相關的二元對立，說明這一地區對“文化主義”概念的定義引起了令人驚訝的共鳴。這一點可以在許多公共政策中看得見，導致在亞洲研究和“亞洲參與”（engagement on Asia）方面資助的傾向性。這種對“文化主義”的理解也

出現在前總理吉拉德（J. E. Gillard）的“《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2012）白皮書”（簡稱《亞洲世紀白皮書》）報告中。這份報告採用“亞洲能力”這一概念來說明公有經濟（包括大學）和私有經濟對該區域事務的推動。

在此背景下，報告建議，對包括漢語在內的五大語言的培訓進行大規模資助。儘管對語言培訓問題仍然存在爭議，但這些公共政策加強了該區域對“文化主義”的特別理解。

在這種環境中形成的“文化主義”，是通過一整套制度與知識的做法，將隱藏在社會、政治關係中的文化過程剝離出來，抽象為一組概念（語言的、宗教的，等等），依次成為能夠從地理區域來理解社會和政治過程的基礎。祇有把“文化主義”問題放在該地區一系列不同的、多元的路徑中去理解，不是從內容而是依據一系列潛在問題的角度去理解，這些問題纔能解決。因為在這些問題的背後，往往是由一種特殊的文化或區域內不一樣的“人們”所產生出的“文化”（literacy）具體問題。“文化主義”的核心是社會和政治關係——權力和衝突問題——經常被挪移和替代，因為文化問題經常被理解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因此，這裏的關鍵點是，如何理解社會和政治變革的非物質方式控制了亞洲研究的方式。這讓人想起了斯坦海爾（Z. Sternhell）闡明問題的方式^②，在反啟蒙的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保持一種強大的理論張力。

在社會研究和區域研究領域，“文化主義”的許多概念不僅深深地影響了“非西方”社會的研究，特別是亞洲研究，而且，“文化主義”問題還不斷影響着這一地區社會科學的組織形式。

①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Z. Sternhell, *The Anti-Enlightenment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2012)白皮書



帕特爾（S. Patel）早已闡明，這些文化主義概念根植於殖民統治——對習俗概念進行定義和排序，形成技術規則，廣泛使用“種姓”、“部落”等概念來定義政治統治。^①這已成為某些學者著作中的習慣用法，如馬姆達尼（M. Mamdani）和德克斯（N. Dirks）的著作。^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些文化主義的看法偽裝成現代化理論被很好地保留了下來；^③而且，這些文化主義的思想繼續在後殖民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和組織中產生迴響。在這些國家中，“二元對立又被重新構建起來，形成傳統與現代兩分法，將具有現代性的殖民計劃合法化，把世界上的人群分為兩種人：傳統人和現代人”。^④

文化主義的影響不僅可以在主流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感覺到，也時常以各式各樣的後現代主義面目出現。例如，波尼特在分析後現代主義理論家阿希斯·南迪（A. Nandy）的著作時極具洞察力，認為南迪使用了批評性概念“傳統”，將其作為政治對抗的基點。這種觀點是，我們早期認可的東方學者的研究範圍有可能發生變化，如果依據“對抗傳統”來看待此問題依然屬於文化主義問題。對傳統的分析是本文的篇幅所不能及的，但更廣泛的看法是，一些後代理論把社會和政治轉化框架化了，這遇到了一些麻煩，因為其依據是“文化”邊界衝突和自己的一套動態系統。

當然，由於亞洲社會經濟的迅速變化，現代化受到了挑戰，但是，作為通過制度與知識構建起來的文化主義在區域研究和社會科學方面依然有着強大的影響力。例如，在分析和理解中國崛起的時候，一些學者常常使用“回歸文明”這樣的概念。康燦雄（D. Kang）認為，亞洲將真實地反映出歐洲的過去。^⑤那時，他使用了一個“東亞史”的概念，從亞洲過去的文化角度來闡明中國的崛起。依據這種觀點，中國的崛起需要到東亞的環境中去理解，也就是從國與國之間的非正式等級關係中去理解。但是，“亞洲世紀”不是回到中國的過去，而是依據潛在的文化實踐活動來看待過去。康燦雄所舉的例子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社會政治過程要從非物質價值演變角度去理解。正是這種文化主義的聚合性，將現代化理論綫索與中國或東亞文明活動概念緊緊聯繫在一起。

卡拉漢（W. A. Callahan）在一篇有啟發性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新術語“漢語說”（Sino Speak），這在康燦雄的著作或馬丁·雅克（M. Jacques）更為通俗的文章中都有反映，使從事中國研究的幾位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者的觀點框架化了。這當然是研究中國的一條綫索，不包括從社會和政治轉化角度對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行研究這樣一個大框架。然而，它依然是一條思想脈絡，對政策制定階層會有特別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卡拉漢認為，“漢語說”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中國是特殊的，其“現代性”由其與衆不同的文明軌跡塑造而成。卡拉漢指出，“漢語說”使用了一套對立詞彙——聚合/離散、東方/西方、傳統/現代、平民/軍事、內部/外部——使中國的未來和世界的未來變得有意義了。^⑥它不從政治角度來理解社會和政治轉化的物質環境，而是賦予一種特別的形式以特權，用馬姆達尼的話說，就是“文化對話”（culture talk）。

二、澳大利亞的公共政策和文化主義問題

以上這些文化主義思想明顯影響了澳大利亞總理對亞洲研究和教學方面公共政策策略的制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中國研究中心得到數百萬元獎勵這件事已充分表明了這樣的看法。葛利姆·巴姆（G. Barme）是該中心的主任，他把稱之為“新漢學”（new Sinology）的研究描繪成“積極參與有關當代中國的事務”

（robust engagement with contemporary China），主張要認識漢學世界的複雜性——不管它是地方性的、區域性的，還是全球性的。它強調對話與融合，也強調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語言和研究上有強烈的學術支撐。我們已看出了文化主義問題這條研究綫索，這就是新漢學。葛利姆·巴姆明顯強調文化基礎，在此基礎上，澳大利亞需要

① S.Patel, "Beyond Binaries: A Case for Self-Reflexive Sociologies", *Current Sociology* 3 (2006) : 381-395.

②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N. Dirks, *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R. Higgott,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Contemporary Debate*(London: Routledge, 1983).

④ S.Patel, "Beyond Binaries: A Case for Self-Reflexive Sociologies", *Current Sociology* 3 (2006) :388.

⑤ D.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⑥ W. A.Callahan ,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2012):36.



與新崛起的中國保持聯繫。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理解並與這個世界保持聯繫就要求“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提高。事實上，在澳大利亞和漢語世界之間，“參與政治學”（politics of engagement）可以從更為廣泛的跨文化文明對話中體現出來。在文化主義分析上存在着模糊性也是事實，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是通過參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而形成的。

在“新漢學”中，更有意義的一個特點是，它與澳大利亞在對中國的研究和教學方面的廣泛資助相適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得到了來自聯邦政府給予的大量的科研資金，用於其研究項目。資助“文化能力”項目中的教學與研究，與澳大利亞參與這一地區的政治存在聯繫，許多人支持在這一項目的研究上加大資助力度。“亞洲能力”這一概念雖沒有定型，但瞭解澳大利亞的主要鄰居——比如，日本、印尼、中國、印度——的文化和文明基礎依靠的是時代氣息。因此，從邏輯學角度看，為了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聯繫，我們需要變得更有“亞洲能力”。這樣的話，亞洲能力策略就是要提高研究能力，暗中支持“區域研究”路徑，強調語言和文化的重要性。亞洲研究中心和以國家研究為導向的多數研究所在過去幾十年中形成了它們自己的研究特色，即從政治和機構方面進行研究。

澳大利亞政府2012年發佈的《亞洲世紀白皮書》主要關注“亞洲世紀”來臨後，公共機構、私人機構在機構和政府管理方面的改革。這就會出現摩擦：治理改革被認為是在治理機構，使它們在區域競爭中更有競爭力。但如果讓公共或私人機構中的高級主管會講一種亞洲語言，這種能力便可從文化方面表現出來。例如，《亞洲世紀白皮書》推薦建立大學生流動項目——這項政策已被吉拉德—陸克文（Gillard—Rudd）政府和自由主義反對派所採納；但是，這種流動需要拓寬澳大利亞大學生的文化視野。從本質上講，《亞洲世紀白皮書》認為，關鍵問題是要培養起一整套文化能力來，將其看作是參與亞洲事務的“亞洲能力”（Asian capability）——這一概念受到了來自墨爾本大學受企業資助的亞洲關係研究所的影響——尋求增加能吸引人的工作地點，使用和留住有亞洲能力研究的人才，即“有知識，有技術，有智慧，能夠成功參與亞洲事務的人”。^①報告建

議，對教學和資源的公共資助要依據這些“亞洲能力”目標來管理，要與這項原則相一致。

這些提法，在澳大利亞公共政策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創新。按照沃克（D. Walker）^②、賈亞蘇里亞（K.Jayasuriya）^③以及比森（M. Beeson）和賈亞蘇里亞的觀點^④，這種文化主義問題在20世紀的澳大利亞就有了。研究主題沒多大變化，一直圍繞着“亞洲能力”展開，內容包括能支撑起亞洲研究的各種各樣的任務和公共政策，時間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的《奧奇默蒂報告》（Auchmuty Report），還有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和英格爾森（Ingleson）的報告。與《加農特報告》（Garnaut Report）有關澳大利亞—亞洲關係的廣泛推進一樣，通過多次呼籲，要求提高研究能力，說明澳大利亞理解這一地區的文化性和社會性，並將其看作是參與策略的一部分。

其實，“亞洲能力”概念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都很流行。例如，這種文化主義問題在以美國為大本營的太平洋關係研究所（IPR）——包括在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的分所裏——得到了不少贊同。該所令人矚目的著作是傑克·謝波德（J. Shepard）的研究——他是澳大利亞人，供職於紐約的太平洋關係研究所——題目是“澳大利亞在遠東的利益和政策”（Australia's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Far East），出版於1939年。在某些方面，這部非凡之作預示了20世紀80年代《加農特報告》中對澳大利亞的定位，即突出澳大利亞作為太平洋中的一個大國要在文化明顯不同的東亞地區發揮作用，這一地區日益增長的發展潛力漸漸顯露出來。像太平洋關係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一樣，它尋求通過新出現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瞭解和發展國際關係。像謝波德這樣的研究人員試圖以非歐洲的方式來理解經濟發展，雖然沒有“冷戰”背景，但在某些方面預見了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這些早期研究把經濟

①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 Century*. Canberra.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asiancentury.dpmc.gov.au/white-paper>) referred to as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2012) : 180.

② D. Walker, *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9).

③ K. Jayasuriya, “Building Citizens: Empire, Asia and the Australian Settlem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010): 29–43.

④ M. Beeson, and K. Jayasuriya, “The Politics of Asian Engagement: Ideas, Institutions and Academic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3(2009): 360–374.



發展理解為一種試驗，“在經濟現代化的同時，如何確保文化的一致性”。^①因此，亞太地區為澳大利亞的政治、經濟發展提供了經驗教訓。在太平洋關係研究所中，還有一位重要的知識分子埃格爾斯頓（F. W. Eggleston, 1875—1954），活躍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位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學派的形成起到過很大作用。

顯然，“文化主義問題”對於公共政策的形成有很大影響，這些政策涉及亞洲研究與教學。但是，我們如何解釋有關亞洲事務的公共政策和這種文化主義之間的關係呢？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在技術官僚的參與政治學中存在一種令人好奇的對稱——《加農特報告》和《肯·亨利報告》（Ken Henry Reports）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強烈影響：參與亞洲事務需要一套正確的經濟政策——但是，“額外經濟維度”（extra economic dimensions）方面的參與經常以文化面目出現。

《亞洲世紀白皮書》中有許多內容涉及經濟方面。在亞洲世紀，為了競爭，需要提高生產力和需要發展，但是，要實現提高生產力和發展的目標會遇到去政治化的問題，需要正確的“文化定位”（cultural fix）。在此基礎上，參與政治學就要從與權力和矛盾關係密切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中擺脫出來。《肯·亨利報告》抓住了關鍵問題，即機構的協作和企業與政府的夥伴關係——對於是否參與而言，這是至關重要的。它使這些問題框架化，作為提高文化能力的一個方面，如把“語言”看作是協作中的至關重要。從表面上看，機構改革要去政治化，目的是讓文化參與進來，拋棄澳大利亞機構轉化中凌亂的政治和社會矛盾。

由於此原因，在技術官僚的參與政治學或機構改革與文化主義問題之間存在密切聯繫。在某種程度上，“機構改革”（institutional reform）成了技術官僚計劃中的重點，與此相關的“額外經濟”問題，在去政治化方面被看作是文化適應的失敗。施托勒（M. A. Stoler）^②認為，技術官僚在面對環境和問題時，一旦他們的技術不能適應他們所尋求的政策或常規目標時，就會出現認知方面的焦慮。在“亞洲參與”案例中，這種失敗導致使用文化主義框架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在方式上避免從政治和社會矛盾衝突方面來分析問題。正是文化主義者和技術給官僚之間的親密關

係極大地推動了相關政策的制定——資助有關亞洲的教學與研究。例如，《亞洲世紀白皮書》就提到優先開展語言教學。從總的傾向上看，它對人文學科明顯有一種偏見，與之相適應的就是不重視社會科學。



澳大利亞積極參與亞洲事務

另一個關鍵問題也涉及了公共政策和文化主義對“亞洲參與”的影響，那就是這一地區在地理劃分上與澳大利亞絕緣。沃克認為，澳大利亞參與這一地區的事務有“地理上的焦慮”：“若不是澳大利亞在19世紀80年代受到亞洲覺醒這一地緣政治抑制，強烈的男性及種族主義所造成的澳大利亞國家主義將會更加激烈。”^③因此，突破“亞洲參與”的地理概念成為“霍克—基廷改革”（Hawke—Keating reforms）之後政治計劃中的經濟現代化的中心問題。這項政治計劃強調，不能祇從經濟利益角度看待亞洲。這一點可從中產階級隊伍的日益龐大中顯現出來——它能為澳大利亞的持續繁榮提供基礎。但是，也祇有自身的現代化並具備相應的機制，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纔可長期利用。而促使自身現代化的觀點，曾經是工黨政府管理國家的核心。所以，“亞洲參與”不僅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現代化十分重要，也與澳大利亞的社會現代化有很大關係。這涉及對亞洲能力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制定。

正是在這方面，對亞洲教學與研究的公共資助成為了“亞洲參與”政治計劃中的最重要部

① N.Brown, "Austral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Image of Asia 1920—1960". *Australian Perceptions of Asia. Australian Cultural History* 9 (1990) : 81.

② M.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D.Walker, *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 1999), 5.

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第一次當總理時就對此進行過很好的總結，他希望：“我們在西方集體中不僅要成為最有亞洲能力的國家，也要成為最有中國能力的國家，因為中國對亞洲未來的影響是巨大的。”^①這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亞洲能力項目不僅要在政策上參與，在方式上還要劃清澳大利亞和這一地區的文化界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亞洲教學與研究的公共資助主要研究亞洲能力中的文化主義問題。這一直是經濟現代化國家計劃的關鍵組成部分。

三、朝向解決問題的路徑：以問題為導向

“亞洲能力”（Asia capability）尋求的路徑是，在處理這一地區“另一邊”（out there）事務時變得更有能力，而不是從整體上生產有關這一地區的一系列問題的知識學問。它不是區域研究（這種研究方式是有問題的），而是將研究路徑放在亞洲能力策略之中，策略依靠的是有關社會和政治變化的一系列假設。這些“假設”要去政治化，或使經濟、社會問題真空化，因為這一地區的挑戰經常是跨邊界的性質問題。隨之而來的是，集中研究對文化獨特性的理解，使常見的趨勢分析、問題分析和過程分析邊緣化。

為了克服亞洲能力模式研究策略上的局限性（這一直是一個主要問題），建議採用“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策略”（Problem Oriented Research Strategy，簡稱“PORS”）：以這一地區新出現的社會、政治環境為基礎，圍繞主要事件或問題以及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轉化難題去研究；要把這一地區當作一個整體去研究。這些研究要根植於可感的、真實的世界性問題，在分析上要與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有廣泛的理論聯繫。這樣的話，能讓我們超越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的簡單劃分，會有大量的研究人員參與到這項研究中來，任何人都可進行研究。

在政府管理方面，這一地區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多。例如，氣候變化問題，金融管理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同樣困擾着澳大利亞的政策制定者。很明顯，我們需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面對和處理這些基本問題上。這些問題雖然起源於某一個國家，但經常是跨國界的；同時，還要瞭解它們在特別的環境中是如何競爭的。由於這個原因，我們要瞭解這一區域內各個國家的特殊性，

以確定其在資本主義轉化時期的社會、文化、政治方面的變化。這是一件勢在必行的事。



在珀斯召開的“博龍亞洲論壇：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會議”

採用這種研究路徑的一個有趣例子是：世界銀行稱，以問題為驅動的研究路徑可用於政府管理改革和政治經濟分析，採用這種路徑研究政府管理和機構改革能取得豐碩成果。政府管理和政治經濟分析路徑“重點放在特別的挑戰或機遇，比如，可以用來分析權力或健康領域或有關促進城市發展方面為什麼動力不足，能夠做哪些事情將這些方面的改革推向前进”。^②採用這樣的視角對於研究政府管理改革方面的問題確實是一條有效路徑，因為政府管理改革主要集中在薄弱環節和難以解決的問題上。這同樣能夠識別出特別的機構和政治經濟推動力在改革方面的成功與失敗。儘管採用這種路徑得出的結論，我們也可能會說得不清楚，或者模棱兩可。

這種新路徑的特點是強烈的跨學科性，在確定問題的性質時保持在研究範圍以內；同時，它強調當代許多問題有跨國界的性質，簡單地用“亞洲能力”這種區域研究模式已不能解決。這裏我不想參與學術界關於兩種知識生產模式孰優孰劣的辯論（模式1是以學科為基礎的基礎研究，模式2是強調解決問題和通過跨學科路徑來生產知識），我祇想說，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策略與所謂模式2的知識生產有着密切關聯，它強調真實世界的問題和跨學科概念。^③

“亞洲世紀”的來臨與知識生產的地點和形式的重大轉向相一致。與此相對照的是，這兩種知識生產模式都強調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

^① D. Walker, *Experiencing Turbulence: Asia in the Australian Imaginary*(New Delhi: Readworthy, 2013),28.

^② World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http://worldbank.org/FAV9CBBG80>.

^③ M.Gibbons, et al.*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London, New Delhi: Sage , 1994).



產。但知識不是死板地限制在學術範圍內，而是存在於各式各樣的網狀策略聯盟和協作中，包括各種各樣的人也參與其中。此處的關鍵點是，它處理的問題要限定在“特別的和地方化的環境”中。^①它有可能將這種轉向延伸到一種新型（new form）知識中。在社會科學領域，將這種轉向看作是兩種知識模式之間的平衡是有益處的。

顯然，祇是對“亞洲能力”關注的背後，表明沒有認識到在社會科學知識性質方面發生的廣泛轉向。由於我們的主要社會科學機構沒有能夠認識到這些轉向，他們也就沒有能夠舉出令人信服的例子來說明資助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祇是當作處理這一地區緊迫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手段。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積極促進某種解決問題的策略。鑑於知識生產的地點和形式的重大轉向，國家研究或區域研究還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但是這些研究要放在導向之中，拋棄過時的“亞洲能力”研究概念。

毫無疑問，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路徑也會遇到一些麻煩。比如，學術獨立的問題，這需要適當的管理和組織。另外，還存在一種危險，即研究變得越來越工具化，並且考慮問題不夠長遠。然而，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我們需要把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結合起來，比如，公共資金的籌措、資助和分配。社會科學工作者面臨的挑戰就是超越“國家框架”來構想如何處置這些公共財產，同時還要考慮在全球社會挑戰中如何與各種人和各種利益打交道。

四、構建全球性的社會科學

構建全球性的社會科學，既要以問題為研究導向，又要超越“方法論上的國家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方法論上的國家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根深蒂固。首先，它想當然地把“國家狀態”（national state）和社會看作參考的框架。當然，如果國家狀態和社會在後殖民時代更為常見的話，國家狀態構成過程必然是區域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然而，由於區域研究的焦點依然是

區域性的，所以，它祇能限定在國家狀態和社會範圍內。

其次，“方法論上的國家主義”沒能認識到許多大家關心的問題，如公共財產的分配、不平等、移民等等，已不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全球力量的來源與轉化已經挑戰了某些“國家”元素。這一點已清楚地表明，全球社會科學的特點是跨國界視角，能詳細審視全球各個地區的社會機制和政治機制。例如，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糾葛放到新興的亞洲經濟中去考慮，比把精力放到徒勞無益地辯論美國衰落、亞洲興起中更有益處。在我看來，祇有把焦點集中到跨國聯結上，纔可以理解亞洲正在發生的巨大轉變。當然，這些跨國過程一直在伴隨着我們，但可以明顯看出，這些相互聯結和機制超過了以往，這種方式也挑戰了“文化主義”在方法論上和國家主義方面的假設。也許，這對於認真研究亞洲的人而言不會感到驚訝，但需要認可的是，“亞洲”概念本身是這些正在變化的聯結和網狀聯繫的產物。亞洲學者在利用跨國視角的優勢時處在理想的位置上，但為此我們需要告別區域研究路徑，儘管它能詳細說明亞洲研究的許多問題。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構建全球社會科學的研究路徑需要建立一套真正的機構夥伴關係，與正在迅猛發展的亞洲社會科學界保持密切聯繫。在生產有關亞洲知識的性質方面，這種關鍵性的轉向已經顯示出來，它將會影響到一些國家的研究方法和優先研究權。比如，澳大利亞和美國。毫無疑問，雖然他們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工作，但這裏提供了機會，即建立更為全球化的和更為平等的社會科學界。所有這一切，要求我們要超越文化主義和與之相聯繫的“亞洲能力”概念，儘管“亞洲能力”造就了澳大利亞的公共政策。

〔編者註：此文的英文稿係作者為參加學術研討會所寫，後根據編輯要求，對原稿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由河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趙長江譯成中文。〕

^① M.Gibbons,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New Delhi: Sage, 1994),3.